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项目成果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 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

郭英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 郭英德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陈丹丽 徐丹丽 徐丹丽

I 郭... II 郭... III 文体论—研究—中国—古代 IV 郭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第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

著作责任者: 郭英德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陈丹丽 徐丹丽 徐丹丽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号 页

网 址: 陈丹丽 徐丹丽 徐丹丽 电子邮箱: 陈丹丽 徐丹丽 徐丹丽

电 话: 邮购部 陈丹丽 发行部 陈丹丽 编辑部 陈丹丽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陈丹丽 徐丹丽 徐丹丽 开本 页 印张 千字

年 月第 版 年 月第 次印刷

定 价: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问：启 功

主编：童庆炳

|         |     |     |     |
|---------|-----|-----|-----|
| 委员：钱中文  | 王先霈 | 程正民 | 朱立元 |
| 童庆炳     | 郭英德 | 金元浦 | 罗 钢 |
| 周 宪     | 陶东风 | 黄卓越 | 王一川 |
| 李春青(常务) | 周小仪 | 曹卫东 |     |

## 目 录

|                          |        |
|--------------------------|--------|
|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     | 童庆炳(员) |
| 前 言 .....                | (员)    |
|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 .....        | (员)    |
| 一、文体的结构层次 .....          | (员)    |
| 二、论体制 .....              | (缘)    |
| 三、论语体 .....              | (怨)    |
| 四、论体式 .....              | (员猿)   |
| 五、论体性 .....              | (员韵)   |
| 六、余论 .....               | (圆)    |
| 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            |        |
|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生成方式片论之一 ..... | (圆怨)   |
| 一、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 .....      | (圆怨)   |
| 二、《尚书》“六体”的生成方式 .....    | (猿)    |
| 三、《诗经》篇章的文体分类 .....      | (猿)    |
| 四、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 .....      | (源)    |
| 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              |        |
|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生成方式片论之二 ..... | (缘)    |
| 一、赋予“文学”含义的“文章” .....    | (缘)    |
| 二、《诗赋略》与文体分类 .....       | (缘)    |
| 三、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 .....   | (缘)    |

|                                |     |
|--------------------------------|-----|
| 《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 .....            | (通) |
| 一、《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之体例 .....     | (通) |
| 二、《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渊源考 .....     | (通) |
| 三、《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归类方法考 .....       | (苑) |
| 四、《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排序原则考 .....       | (苑) |
| 五、《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所著文辞篇数与文集编纂 ..... | (愿) |
| 六、结论 .....                     | (愿) |
| 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例与选文范围            |     |
| ——中国古代总集分体编纂体例考论之一 .....       | (怨) |
| 一、总集的生成及其编纂体例 .....            | (怨) |
| 二、历代《文选》类总集概说 .....            | (怨) |
| 三、历代《文选》类总集的选文范围 .....         | (园) |
| 附录 历代《文选》类总集文体分类对照表 .....      | (园) |
| 历代《文选》类总集的分体归类                 |     |
| ——中国古代总集分体编纂体例考论之二 .....       | (园) |
| 一、分体归类的基本类型 .....              | (园) |
| 二、命名方式与分体归类 .....              | (园) |
| 三、分合异同与分体归类 .....              | (缘) |
| 四、余论 类分与类从 .....               | (缘) |
| 《文选》类总集体类排序的规则与体例              |     |
| ——中国古代总集分体编纂体例考论之三 .....       | (缘) |
| 一、《文选序》的体类排序 .....             | (缘) |
| 二、体类排序的基本体例 .....              | (园) |
| 三、体类排序与文化观念 .....              | (园) |
| 四、余论 有序与无序 .....               | (愿) |
| 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体式与原则                |     |
| ——以《文选》类总集的文体二级分类为中心 .....     | (愿) |
| 一、总集二级分类的基本体式 .....            | (愿) |

|                    |      |
|--------------------|------|
| 二、分类体式的生成与功能 ..... | (四四) |
| 三、分类原则与分类实践 .....  | (四五) |
| 后 记 .....          | (四六) |
| 主要参考书目 .....       | (四七) |

##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童庆炳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宪法性”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化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人们已经对兴起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本自身,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的紧迫问题。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文本自足”的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

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无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的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 20 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庸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主要的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唯”这些东西为圭臬,为上帝,为神明,那么物欲、金钱欲、情欲、交换欲等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

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语境,乃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并非完全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目前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过分“社会学”化的话语,也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面临学科体系受到冲击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如果不一味滑向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不一味坚持其二元对立的僵硬的方法,那么由于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和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使文学理论原有格局发生变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文革”前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经历过“文革”的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

成果 , 还有其他成果 , 只要是好的 , 具有真理性的 , 不但要继承下来 , 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在审美、主体、语言和其他方面 , 仍然有发现的广阔的空间。

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 , 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 , 怎么能把“诗意”“反”掉呢? 我们仍然坚持 , 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 , 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 , 就不值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 , 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 , 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 , 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 , 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分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 , “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 , 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 , 但又是文化的 , 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 , 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 , 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 , 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我们不必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外国的文化研究与我们的文化研究究竟有什么异同? 一般认为 , 国外的文化研究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 , 主要特色是一种政治批判 , 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晚期 , 早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已经被文化的渗透所代替 , 是让人异化 , 舒舒服服地变成奴隶 , 成了奴隶还感觉不到。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它关键的词语是种族问题和东方主义、性别问题和女性主义、地域问题和社群主义、阶级问题和社会主义、古今问题和新历史主义等。其研究是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出发 , 而选取了这样一些话题进行研究 , 从而形成一批批的文艺学流派。我们的文化研究则要走自己的路 , 或者说要按照中国自身的文化实际来确定我们自身的文化诗学的思路。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文化诗学研究就其基本原则来说可以有五点:

第一是历史优先原则。文化语境的研究,不论我们是研究现代的文学问题还是古代的文学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放置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尽管绝对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难以追寻,但是无论如何难,我们还是要自觉地去。过去我们的研究也常这样做,但我们常常不够自觉。更多的时候,就理论问题谈理论问题,注意的是观点和形式逻辑,所以别的专业的人士常说我们搞理论的人所写的文章比较空。文化诗学应该自觉改变这种状况,使我们讨论的问题进入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所讨论问题的针对性自然会凸现出来,自然会摆脱那种脱离现实的状况。

第二是对话原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还是研究前人的文学理论,都是对于作家、作品或原有理论家、理论作品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不是独语,而是一种对话。我一直主张古今要对话,古和今是两个主体,要进行对话,要把古代的东西激活,然后进行对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其次是中西的问题。与古今问题一样,哪些可以全球化,哪些不可以全球化,实际上这也是文化研究中很热的一个问题,这里面问题很多。我认为,中西问题是一个对话和共享的问题。另外,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或理论家的一种对话。对话要真正的平等才能深入地展开。就像我们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一定要平等相待,十分的恳切和真诚,彼此才能敞开心扉,通过交谈,做到双方都受到教益。我们在对待作家(作品)、理论家(理论著作)的研究中也应该是如此。把对象也当成一个值得尊崇的主体,想尽一切办法激活它,让它似乎也真的成为一个鲜活的主体,能够袒露自己的真意,而作为研究者也自然是一个主体,能以商榷的态度,而不是以强加于人的态度,与对象实现真实的对话。只有在这种对话中,研究才是比较客观的和可靠的,而不是主观的、随意的。

第三是自洽原则。文化诗学的研究,应该是圆融的,能够自圆其说的。例如其中的阐释、比较,不能自相矛盾或前后矛盾,应该在观点和

方法上一以贯之,逻辑上能自洽而圆通。你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和新的比较,但必须合情合理。所有片面的论述,其中弱点之一,就是不能逻辑自洽。

第四是联系现实问题原则。学术研究完全可以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的独立性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初的杰出学者王国维就说得很清楚。但文化诗学的思路则如上面所述,应该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研究,提炼出某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来。这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正好是现实所缺失的东西,因此我们通过文化诗学所获得的成果可以弥补现实的不足,是对现实的一种回赠。当然,我们的研究可能不是对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正面研究,不可能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研究那样正面地解决社会问题。但从诗学的视野研究,可以以间接方式回应社会,不也很好吗!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累积的问题很多。文化诗学应该有问题意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的文化研究应该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对诗意的追求。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摒弃诗意视角。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大可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

## 前 言

本书所说的“文体”，指文学体裁或文学类型；而“文体学”，则指有关各种文体的理论批评和实践总结。

中国古代的文体数以百计，纷繁复杂，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也源远流长，美不胜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文体学是世界文体学的一个珍贵宝藏，是人类文艺思想的一份宝贵财富，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丰富资源。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学，有利于切实把握中国古代文艺学思想的精髓，有利于沉潜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奥秘。

20世纪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体和文体学的研究一直十分关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体研究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文体学研究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仅就专著而言，有的综合探讨古代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如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等<sup>〔员〕</sup>；有的深入研究某一文体的形态流变，如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等<sup>〔圆〕</sup>；有的对某一时代、某一理论家的文体理论进行论析，如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各册中的有关章节，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的有关章节，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李长徽《文心雕龙 文体论研究》等<sup>〔猿〕</sup>。

但是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构成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有许多学术空白点亟须填补。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总体的、综合的研究，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的学术课题。研究这一课

题,不仅是对 20 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文体和文体学研究成果的总结,更是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深层发掘。因此,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有效地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有效地促进有中国特色文艺学的理论建设,有效地促进世界性的现代文艺学的理论建设。

近缘年来,我对中国古代文体学做了一些浅尝辄止的研究,本书就是这些研究的一束文稿。在这束不成熟的文稿中,我提出了下列一些原创性的学术观点:

我认为,如果以“文体”一词指称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的话,那么,文体的基本结构应由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构成。体制指文体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语体指文体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体式指文体的表现方式,体性指文体的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文体的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的构成、特征和功能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考察和精到的论析。他们认为,一种文体的体制,大致由字句和篇幅的长短、音律的规范与变异、句子和篇章的构架三个部分构成;每一种文体都有一整套自成系统的语词和独特的语音、语义、句法等修辞手段,形成各种文体独特的语言风格;对赋、比、兴以及抒情体、叙事体、戏剧体、议论体、说明体的多元选择和复杂组合,构成不同文体各具特色的表现方式;文体所赖以生成和确立的审美需要,有时是现实性的,有时是观念性的,二者的综合构成文体的体性。文体基本结构不同要素、不同层次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一种文体独特的审美规范。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文体基本结构的论析,构成了中国古代的文体形态学。文体形态学是文体源流学、文体分类学、文体风格学、文体文化学的前提和基础。

我认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首先萌生于人们对特定社会行为的分类,不同行为方式的类别分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原初的生成方式,因此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原初形态无疑是以不同的“言说”方式作为分类标准的。当一种“言说”方式被人们约定俗成地确认为某一“类名”以后，与这种“言说”方式相对应的文辞方式就形成具有特定文体形态特征的文本方式，于是人们将文本方式相类似的篇章类聚到共同的“类名”之中，“以类相从”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文体，从而形成一定的文体序列。经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文体分类的社会性特征深深地蕴藏于文体的文本方式之中，并由文体独特的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功能得以彰显。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是在一种庞杂的文章体系之内生成的。就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而言，“泛文学观”是其得以滋生繁衍的沃壤，“因文立体”是其得以生成确立的基本路数，“异中求同”则是其得以归纳类从的重要途径。

我认为，《后汉书》列传对传主所著文辞的著录，包括所著各种文体及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这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归类，大致采用“因文立体”的路数。这种通过归纳法而产生文类的思路，恰好与西方文体分类惯用的演绎法的思路形成鲜明的对照。《后汉书》列传传主著述的著录次序，一般先经、史、子著述，后文辞著述，这正是东汉中期以来经学与文辞相对称的时代观念的延续和强化。《后汉书》对传主所著各种文体的著录次序，一般先诗、赋、碑、诔、颂、铭、赞、箴等“有韵之文”，后表、奏、论、议、令、教、策、书、记、檄、说等“无韵之笔”，这一著录次序则表现出从汉末至刘宋区分文笔的文体辨析观念已趋于明朗。《后汉书》列传在著录传主著述时，最后大多著录传主所著文辞的总篇数，这实际上可视为作家著述编定成集的一个可靠证明。而且，《后汉书》按文体著录传主著述，实际上也为分体编撰文集做了初步的准备，并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六朝人鲜明的文体归类意识、文体辨析观念和文集编纂观念。

我认为，总集的生成，盖由于东汉末年之后别集繁兴，为了避免读者翻检之劳倦，便于作者属辞之取则，各种文集总钞便逐渐涌现。正因为总集的原初功能是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取则，因此从挚虞《文章流别集》发端，区别不同文体加以选编著录，就成为总集的基本编纂体例。

历代兼收诗文的总集大体上遵循《文选》所奠定的选文范围、分体归类、体类排序、二级分类、篇章排序等具体的编纂体例。综合考察历代《文选》类总集在选文范围方面的基本体例,主要为:(一)仅选“文”或“文章”,一般不包括经籍、史籍、子籍;(二)诗文兼收;(三)兼收各种实用性、说理性、叙事性、抒情性的文体;(四)科举考试文体,有的入选,有的不入选,其标准盖在其是否符合“文”或“文章”的基本形态特征;(五)往往选录文人“以文为戏”之文与民间实用性文体。对历代《文选》类总集选文范围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本架构,从而反思现今的文学史写作。

我认为,中国古代文体的命名方式主要有四种,即功能命名法、篇章命名法、类同命名法和形态命名法,其中功能命名法是中国古代文体最基本的命名方式。受一元论的宇宙生成论和哲学本体论的影响,在对文体进行区分辨析、分体归类时,中国古人不仅着意于辨异,也关注于求同,而且既关注其“本”之同,也关注其“用”之同。同中见异,异同见同,这正是中国古人对文体进行分体归类的精髓所在。当人们更多地着眼于从行为方式与文体功能的角度对文体进行分体归类时,往往倾向于文体的“类分”,而当人们更多地着眼于从形态特征的角度对文体进行分体归类时,则往往倾向于文体的“类从”。

我认为,历代《文选》类总集的文体排序大抵遵循先文后笔、先源后流、先公后私、先生后死、先雅后俗等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分别体现了文体排序的语体特征、时间特征、空间特征、功能特征和审美特征,并分别根基于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分类观念、“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尊卑亲疏的宗法观念、“重生”“贵生”的传统伦理观念以及雅俗之辨的文化观念。遵循这些排序规则,历代《文选》类总集在文体排序的体例上,大都将与“诗”关系密切的“有韵之文”置于各种文体序列之首,其次是官府应用文体,紧随其后的是文人日常应用文体或“纯文学”文体中的衍生文体,伤悼文体序列则一般置于一部总集文体排序之末。在隶属同一文体序列的文体中,总是雅体居前,俗体居后。在历代《文选》类总集

的编纂中,这一基本体例的运用呈现出混杂性、交错性的特征,这同中国古代总集编纂时“唯假文以辨体,非立体而选文”的编纂方式有关,并体现出中国古代“因文立体”的文体分类意识。

我认为,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历代《文选》类总集文体的二级分类构成了三种基本体式,即以体分类、以题分类和以时分类。中国古代依据不同文体形态编纂的总集,也大都分别采用这三种分类体式。采用以体分类的体式编纂集部文献,大约起于东汉时期。以题分类的分类体式与中国古代类书的编纂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可以说是类书编纂的派生物。按作家时代先后排序的总集则略为晚出。在总集编纂的实践中,违背排他性、同一性、穷尽性等分类学基本原则的现象不仅在在皆是,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惯例。这一文体分类的特征与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

上述这些原创性的学术观点虽然还略显稚嫩,我却不免敝帚自珍,因为它们是我这些年日以继夜地阅读中国古代文体学相关文献的心得,更是我这些年苦思冥想地探索中国古代文体学相关理论问题的结晶。杜甫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仍将不断地品味写作这一束文稿的种种酸甜苦辣,同时也真诚地希望能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教。

## 注 释

〔员〕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

〔圆〕 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猿〕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郭英德、谢思炜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2006年。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李长徽:《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